

0307

唐山交大学生运动

(1946—19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唐山交大学生运动

(1946—1949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开 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04 号

唐山交大学生运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八号)

河北省保定市华欣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ISBN 7-80077-811-8/K·13 定价: 6.00 元

主 编：李 汉（特邀） 王长胜

副主编：曹 明（特邀） 王 良（特邀）

吴 天

前 言

解放战争时期，唐山交大同学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迎来了唐山的解放。唐山交大进步学生运动是唐山党组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重要环节之一。唐山交大进步学生还按照党组织指示，冒着生命危险，向解放区输送了数百名知识分子，为解决我党接管城市急需的干部，作出了贡献。这些输送到解放区工作的同志，解放后，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及领导干部，这是我党领导的唐山交大学生运动又一突出成绩。唐山交大还在南迁上海中，重建了党组织，领导广大同学，在国民党严重白色恐怖威胁下，以大无畏精神，阻止了学校再南迁，和上海同学并肩战斗，为上海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们邀请当年亲自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的同学，写出回忆录，汇集成本这本小册子，希望这些用血与火写下来的可歌可泣事迹，能够激励后来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唐山交大，在1930年命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46年又命名为唐山工学院，因此本书中，对校名有的写为唐山交大，有的写为交大唐院，有的写为唐院，我们认为这些提法都符合当时情况，编者未作统一调整。唐山交大大批同学到解放区参加工作后，都改为化名，本书为吻合当时史实，一律用在校原名。

编 者

1993年12月

目 录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两年——记解放战争时期（1946—

1948）唐山交大的学生运动和党组织活动	施不为（1）
唐山地下党在交大的活动	高泽兰（24）
华北学联帮助我们前进	孙 梁（执笔） 全钰嘉（33）
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唐山交大的学生运动	黄健德（41）
我所知道的唐院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聂嘉良（49）
在唐山的反内战运动	郑崇达（56）
胜利夺取领导权，掀起学运新高潮——回忆 1948 年 3 月	

至 8 月唐山交大的学生运动

..... 陈国藩 张 毅 王泽洲 张广年	(60)
保卫华北学联	严良田（74）
北平反剿民要活命游行	常凤镐（78）
扬华三斋会议	严良田（81）
天亮前后的唐山交大	常凤镐（83）
投身革命，人生道路的选择	郭汉盛（90）
投奔解放区	郭河盛（95）
第二战线亲历记	刘正祥（100）
党支部撤回解放区	赵清荣（117）
回忆唐山交大老大哥对我的启迪	陆廷麟（122）
黎明前的战斗——唐院在上海阶段的学生运动	
..... 阎 焘 陈国藩 张 毅	(127)
随校南迁追忆	严良田（142）
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	唐振绪口述 谭湘整理（150）

“到解放区去”	孙 梁 (164)
回忆向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	黄章尧 (166)
第一次当地下交通员	胡正元 (171)
向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的经过	孙 梁 (175)
在地下党领导下向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	翁其瑞 (180)
在学运中进步的民社	郑崇达 (184)
“民社”在进步学生运动中的活动	聂嘉良 (191)
“古怪”歌咏队	陈国藩 (196)
到工人群众中去——记唐山交大工友夜校	常凤镐 (202)
我在“五卅一”图书馆作的部分工作	黄章尧 (207)
我与“五卅一”图书馆结缘	严良田 (211)
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忆地下党领导下的“文化沙龙”	张 毅 (216)
《唐院导报》的经历	刘正祥 (222)
暑期中学生补习班	刘正祥 (228)
《铎声社》的铎声	刘正祥 (230)
《大家谈报》	严良田 (235)
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唐山工学院支部的成立	
.....	陈国藩 (237)
唐山交大“春牛社”的成立与活动回顾	刘丕绩 (240)
《短波报》散记	严良田 (244)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两年

——记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8）

唐山交大的学生运动和党组织活动

施不为^①

我是于1946年9月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的，1948年8月离开学校进入冀东解放区，1948年12月唐解放，重回唐山。前后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却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两年，是难以忘却的两年。

这两年是国民党由疯狂发动内战到全面溃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全国解放的两年，是唐山交大广大同学从埋头读书，国民党、三青团横行学校到暴发轰轰烈烈的进步学生运动，并迎来解放，获得学校新生的两年；是我们这些“年方弱冠”的青年，在进步学生运动中获得锻炼，提高觉悟，许多同学从单纯的民主爱国到进入解放区并进而成为坚定共产主义者的两年。现在回忆这两年的历程，不仅十分怀念，而且感到十分自豪。

下面，我将对1946至1948年期间党组织的活动和进步学生运动，就亲历亲见的一些事件作一些回忆，使后来的同学们有所了解。

令人惋惜的是，作为当时党支部主要负责人的陈士坚（陈毅

① 施不为（化名方生）：1946年考入唐山交大冶金系，曾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情报所所长，现已离休。

人)同志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许多党的重要活动,以及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都是他经手的,我们无法来代替他回忆,成为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的党员陈秋英(陈宁)同志、将良海(石军)同志,也先后因病去世,再不能同我们一起来回忆。活着的几个党员,也是天各一方,难以聚首共同回忆。因此,我的这个回忆,缺少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引以为憾!

一、最初的斗争

1. 我是1946年9月在上海考取唐山交大后,到唐山人学的。在这以前,我于1945年在上海入党。由于国民党正处心积虑发动内战,党组织根据中央对白区党组织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指示,组织比较暴露的党员适当疏散转移。正在这时,唐山交大在上海招生,孙梁约我去投考,我们俩就以同等学历报考,并录取了。党组织同意我去唐山上学。临走时,当时领导我们的乔石同志告诉了我转关系的方法,同时又告诉我现在形势紧张,可能一时待接不到,要扎根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埋伏下来。

2. 我们于9月中旬乘船从上海经秦皇岛去唐山。到唐山后的第三天,就看到校部办公室门口贴的一张布告,要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去训导处登记。不久,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位三青团的负责人担任了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这里国民党和三青团公开活动并把持一切。这一点与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上海,由于三青团员领津贴,在学生运动中尽干破坏捣乱的事,自己把自己搞臭了,不敢在校园里公开露面,只能靠打小报告、搞小动作过日子。而学生会和学联大都在党的领导下,以进步学生为骨干公开活动,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在这里,三青团竟如此活跃,如此把持一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通过老同学作了一些了解。原来自从陈立夫到平越视察后，看到学校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立即成立了“训导处”，指派了教导主任，成立了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唐山工学院区党部，解散了进步社团，逮捕并开除了地下党员，封闭了进步书店，致使学校的党组织遭破坏，进步学生运动遭受了暂时的挫折。直到1946年，学校从重庆迁回唐山，党的组织仍未恢复，学校仍被国民党、三青团控制着。这一切意味着今后的斗争是尖锐而残酷的。

3. 到唐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接关系，也不清楚谁是党员。我只能按照党历来的教导和离上海时党组织的指示，到群众中去，从最底层的地方做起。一是广交朋友，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要去，都要交朋友。记得开学不久，有一张签名单传到我手里，说愿意参加基督教团契的请签名。我不知道团契是干什么的，问清了团契是基督教的外围组织，还不是入教。我想起了上海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几乎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于是就签名参加了。这个团契叫“藜峨团契”，参加的人不少，还有一个牧师肖时民，是训导处的职员。活动也不少，经常有小组活动，做礼拜，圣诞节还演戏。我参加团契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同年級的如张毅、胡正元（他们原来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等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学生运动的战友，他们都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相继去了解放区，胡正元还入了党。藜峨团契也成为我隐蔽身份的好地方，因为它没有政治色彩，左中右的人都有，三青团中也有团契成员，不少教授及家属也参加团契活动，所以在团契里活而不红。

联系群众的第二件事是努力为同学服务。凡是同学要办的事，都尽量去办。如开学了还没有教科书，我就把教授的讲义拿来，请同学分头誊写，拿到市里去石印，人手一份。伙食办得不好，又发现管理员贪污，孙梁和我就组织学生膳团，自己管理，自己上街买菜，尽量让同学省钱又吃饱。这样，从一件件小事做起，赢

得了同学的信任。在班长选举时，我被选为班长，孙梁、常凤镛等都曾被选为班长、副班长，事情就好办了。

4. 在置身于群众中之后，我们逐步引导同学敢于为自身的利益团结起来斗争。一件最有趣的事是反拖尸斗争。当时，校园里盛行一种从美国传来的恶作剧，“叫拖尸”（英文叫 TOSS，意即高年级学生可以任意欺侮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稍有不慎，叫高年级同学看不惯，就要被“拖尸”，轻则泼墨水，剪头发，重则扔到水里去，弄得人人自危。1946 年秋刚开学，有一对二年级的男女同学因为形影不离，被“拖尸”，把蓝墨水泼到了衣服上。许多人敢怒不敢言。后来，在一次足球友谊赛中，低年级球队胜了高年级，高年级学生就扬言要“拖尸”。这时，我们就联络一年级中的积极分子在扬华斋宿舍开会，主张团结起来反“拖尸”，当场起草了《反拖尸宣言》，签名的有二十多人。为了避免他们寻衅报复，我们在签名时采取圆圈方式，找不到谁是头，谁是第一个签名的。这份《反拖尸宣言》一贴出，轰动了全校，得到了全校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从此，校园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拖尸”，也再没有人敢提“拖尸”二字。这次活动的意义很大，它第一次显示了新生的力量，显示了团结就是力量。同时，它第一次使许多进步同学互相认识，组织了起来，在《宣言》上签名的，如黄健德、黄仲瑜、孙梁、常凤镛、张毅、胡正元、徐国华、林析等等，后来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在班长选举、学生代表选举中，土木系是黄健德、黄仲瑜等，矿冶系是我、常凤镛、孙梁等，在校园里已形成一股力量。

5. 最早的政治运动是 1946 年 12 月的反美爱国运动。12 月 24 日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北京学生纷纷抗议，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一些进步社团（如民社等）及进步同学出壁报、写文章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去！但是当时学生自治会掌握在三青团手里，按兵不

动，我们一面在班长联席会上据理力争，要求组织抗议活动；一面在下面发动，以实际行动抗议。但是由于三青团的阻挠，进步学生还未全面组织起来等种种原因，运动没有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加上考试临近，功课的压力等等，这次运动在呼喊一阵以后就淡漠下来了。但是，终究他在静谧的校园里点起了进步学生运动、政治运动的火炬，许多进步社团和壁报相继出现，学生运动的波澜已推动广大学生走上政治运动的前台，要想抑制也抑制不了了。

二、陈士坚（陈毅人）的使命

6. 到1947年上半年，仍没有人来接关系，我也找不到谁是党员。

其实，共产党员就在眼前，他就是土木系一年级学生陈士坚（进解放区后改名陈毅人，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据后来了解，他哥哥陈本坚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党员（也即陈萍舟同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出版局局长），陈士坚在天津上中学后，曾到开滦煤矿工务员训练学校学习，因参加抗日活动暴露，于1945年5月进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日本投降后，被派到天津市做地下工作，同时入党。1946年10月，唐山交大从重庆迁回唐山，他父亲是校医。经组织同意，他利用这个关系到唐山交大边学习，边做党的工作，仍受天津市委的领导。因为他是土木系的学生，我是冶金系的，开始接触不多，互相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其实各自都在独立地工作。

我现在已记不起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认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接触多起来了。他也是“藜峨团契”的参加者，他也积极参加了反“拖尸”活动。但是他的活动范围在土木系，在广东同乡会等等。我的活动范围在矿冶系，在低年级同学中，接触不多。从沈

崇事件起，随着学生运动的开展，由于我们都是积极分子，接触就多起来。到1947年四五月，随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开展，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常常到他家里去。他家有一幢小洋房、单独的院落。他父亲住东房，他住西房，中间隔着客厅，经常空着。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在他家纵论国家大事，研究学生运动，他能从地板底下拿出进步书籍给我看，包括有些是解放区出版的书。还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就在这时，他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取名“拓荒读书会”，成员大多是一年级的积极分子，如黄健德、黄仲瑜、张毅、胡正元、陈秋英、钟贻荪、黄宗煊等，我也是其中之一。读书会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章程，主要就是读书，并以读书来联络和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利用他家这良好的条件，确实联络和培养了不少进步同学。但为了避免暴露，也没有组织太多的集体活动。在“五卅一”事件后，成立了“五卅一”图书馆，读书活动的场地就逐渐转移到“五卅一”图书馆了。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断定他与解放区有联系，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接上关系，非找他不可。因此，在1947年5月左右，我就开始向他试探。我向他表示了找党的意愿，问他能不能找到党。其实，他也在观察和试探我，所以，试探很顺利，两次谈过后，他就表示可以找到党组织。我经过分析，即使他不是党员，也不会出卖我、暴露我，我就原原本本将在上海入党，来唐山后至今没有接上关系的情况，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帮助我找到党的组织，接上关系。他要我写个报告，交给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通知我，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承认我的党籍，但希望我最好仍能转到正式关系，在转到以前可作为重新入党。他并且告诉我他也是党员，受天津领导，从今后，我们俩人建立党的组织。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再没有问其他情况。不过，后来的情况很清楚，到这时为止，我俩入是当时唐山交大仅有的两个党员，从

此，接上关系，变为有组织的活动了，我个人象一只离群的孤雁重新找到雁群，有说不出的喜悦。

不过，我俩当时都还是一年级的学生，陈士坚还是试读生，影响有限，难以在公开场合取得领导地位，因此，1947年上半年我们的主要活动，还是在下层做好推动工作。

7. 夺取学生会的领导权是推动学生运动的重要一环。鉴于过去学生会被三青团把持的情况，1947年初，经过进步学生酝酿，推出二年级进步同学许晋堃出来竞选，我们在下面发动群众助选。当时，一、二年级学生加起来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三，有了上学期群众工作的基础，经过反对美军暴行等活动，同学们的参政意识提高了，加上四年级毕业班一般不积极竞选，结果，许晋堃顺利当选。理事中进步学生居多数，如全钰嘉等，但也混进了个别三青团员。总的来说，这届学生会为进步学生所掌握，对推动学生运动有利。在许晋堃的回忆文章中，说我和黄健德都是理事，是他弄错了。我们当时都是一年级学生，这届理事中没有一年级学生，历来一年级学生是难以进入学生会理事圈的。我俩是1948年学生会的理事。但是我俩人都是班长，可能他记错了，把班长联席会的成员记成理事会成员了。

8. 进入1947年，群众工作有很大进步。首先，在陈士坚和我们的发起推动下，成立了以一年级同学为基础的歌咏队，主要演唱当时流行在平津进步学生中的进步歌曲。由于演唱的第一个歌是《古怪歌》，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取名《古怪歌咏队》。1947年春天成立时才20多名队员，以后发展到60多名，最盛时达100多名，几乎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

陈士坚和我都参加了歌咏队做组织工作。至于歌舞，主要是依靠一些能人，如队长有陈国藩，指挥有张必恭，歌唱演员有张柏馨，舞蹈演员有张毅、胡正元等等，用不着我们操心。张必恭是教授张正平的儿子，在校园西北角有一幢单独的小洋楼，而且

张教授还在其他学校兼课，常常不在校，因此，张必恭的家就成为歌咏队的据点，开会、写壁报、印歌篇，都在他家。一到运动，开会、写标语、印传单也都利用张必恭的家，十分安全。这里成了除陈士坚家以外，第二个更公开的活动场所。

古怪歌咏队从3月成立，4月就在护校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发挥了宣传作用、组织作用。5月15日校庆四十二周年时，在纪念晚会上演出，受到同学们欢迎，一炮打响。在以后的学生运动中，古怪歌咏队的队员绝大部分是积极分子和骨干，到1948年10月，相当一部分进了解放区。留在南方的也参加了党和“民青”，直到解放，古怪歌咏队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活跃的社团。

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参加“民社”，以扩大加强“民社”的作用。

“民社”是唐山交大学生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社团。参加的成员大都是学生中学习成绩较好，又爱国爱民的同学。它的成员遍布国内外，包括有些已毕业分配工作和出国留学的，如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能宽等。他们的思想有个转变的过程，在抗战时期，他们爱国爱民，总想在“工业救国”等道路上找到救国救民之路，所以取名“民社”。抗战胜利以后，复员回到唐山，看到内战爆发，民不聊生，感到没有出路，开始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他们办的刊物如《谈论圈》、《建设者》等从纯粹学术的圈子跳出来，评论国是，成为学生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喉舌。因此，利用“民社”吸收新成员的机会，我和陈士坚商量，组织一些功课较好的进步同学参加“民社”，一方面学习他们的风格，锻炼提高我们自己，一方面补充新的血液，推动“民社”更加进步，更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所以，在1947年上半年，我、黄健德、常凤镛、孙梁、陈秋英等都参加了民社。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但是，从中得到很大锻炼。历史证明，“民社”的言论往往在学生运动中起指导作用，先驱作用。

民社的成员在1947、1948年进步学生会及相应的社团、部门中都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成员后来都进了解放区，入了党，解放后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如聂嘉良、老瑞森、万凡俦、黄章尧、孙粹宇、全钰嘉、胡世斌、郑崇达、王世章、吴占裘、谢学铨等。许晋堃也是“民社”社员。

9. 1947年上半年，迎来了学生运动的高潮，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政府官吏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都反映到学校里来。教授们因为工资太低、生活下降，甚至发不出薪水，于1月8日罢教一天。不少同学因家庭接济不上，交不起伙食费。学生的伙食越来越差，连窝窝头都吃不饱，有一个同学贫病交加，无法自拔，吊死在校园里。这一切都激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正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在4月初要调整院系，压缩教育经费。其中，要取消交通大学校名，把上海交大改名南洋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已把唐山交大改名唐山工学院）。上海交大的学生闻讯十分愤懑，发起了“护校运动”，自己开着火车去南京请愿。同时通电北京、唐山两交大，要求一致行动。消息传来，事关全体师生的切身利益，包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在内的全体师生都支持“护校运动”，要求保留校名，增加教育经费。在学生代表会议上成立的“护校委员会”中，除许晋堃代表学生会外，另两名均是三青团负责人，派往各地的联络代表，也大都三青团员。

就在这同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平津学生积极响应，在1947年5月20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我校护校委员会派往北京的联络代表在路旁观看北京学生的游行时被捕。消息传到唐山，群情激愤，一面要求集体去北京请愿，要求放人；一面要求响应平津学生的运动，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唐山地处偏僻，消息一般滞后。北京学生“五二〇”大示威，并成立了华北学联，决议在6月2日举行更大的示威游行，当时我们还不清楚，护校代表杜炳文等二人的被捕，促进了消息的传播，我们顺水推舟，把护校运动引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这里附带要说明一下，难道当时党内没有传达什么精神吗？是的。当时我们两个党员还没有接上关系。陈士坚受天津市委领导，领导机关还不是学委，所以对唐山学运的直接领导慢了一些。唐山市工委的重点在工人运动，有学生党组织的学校只有开滦中学，与交大没有党的联系。加上我们当时还没有参加华北学联，北京方面也得不到直接的指导。

就在这种情况下，陈士坚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一些三青团分子竭力反对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主张学生不要过问政治，把运动限制在“护校”的范围内，进步学生则要求与各地学生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班代表联席会议上争论十分激烈。陈士坚同志虽然不是代表，但是他在会下与一些进步同学召开座谈会，研究战略策略，指出一方面要努力把护校运动提高和转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另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如果三青团阻挠学生会直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可以象“护校委员会”一样，单独成立一个委员会。后来正如预料的那样，三青团竭力反对和阻挠，学生代表会议就决定成立一个单独的“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由姚葛民任主席，委员有万凡俦、老瑞森、孙焯宇、聂嘉良、黄健德等，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五·二〇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组织了第一次反饥饿、反内战上街宣传。

学校当局怕事态扩大，派人亲自到北京把杜炳文等二人保释出来。

10. 在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后，就积极准备参加“六二”大示威，为了让消息闭塞的唐山市市民事先有所了解，决定在5月31日上街宣传。一共组织了5支宣传队，